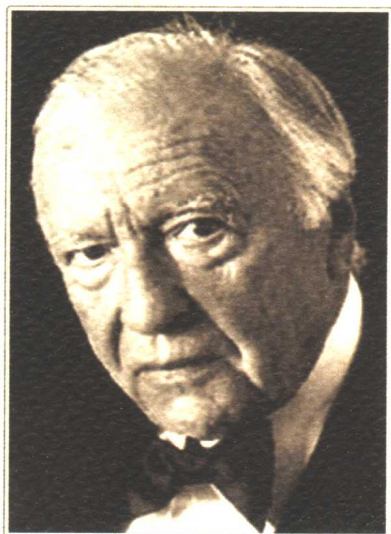




哲 学 生 涯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著



商 務 中 書 館

哲 学 生 涯

——我的回顾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著

陈 春 文 译

关于自己,我们宁可沉默。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生涯：我的回顾 / [德] 伽达默尔著；陈春文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SBN 7-100-03699-2

I. 哲… II. ①伽… ②陈… III. 伽达默尔—自传
IV. B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71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哲 学 生 涯

——我的回顾

[德]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著

陈春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3699-2/B·554

2003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2 插页 2

印数 5 000 册

定价：14.00 元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目 录

布莱斯劳的童年·····	1
马堡的回忆·····	8
1. 大学生年代 ·····	8
2. 目空一切的年代 ·····	23
3. 讲师年代 ·····	36
4. 保罗·那托尔普 ·····	50
5. 马克斯·舍勒 ·····	58
6. 奥斯卡·许雷尔 ·····	68
7. 马克斯·科默雷尔 ·····	82
莱比锡·····	103
1. 恐慌 ·····	103
2. 幻灭 ·····	114
法兰克福插曲·····	130
1. 法兰克福 ·····	130
2. 卡尔·赖因哈特 ·····	140
3. 汉斯·李普斯 ·····	150
海德堡·····	156
1. 海德堡 ·····	156
2. 卡尔·雅斯贝尔斯 ·····	187
3. 马丁·海德格尔 ·····	198

4. 格哈德·克吕格尔	210
5. 卡尔·勒维特	218
人名索引.....	228
译后记.....	234

布莱斯劳的童年

7

一个本世纪初的孩子，在本世纪最后一个 25 年的开始转向对过去的回忆。一个教授的儿子，随后自己也成了教授，他该叙述点什么呢？写当时是什么样子？写什么呢？肯定不只是写那些在他的记忆里闪现出来的东西，从最早的童年开始：艾达玛牌奶酪的红盒子，马堡艾弗尔大街上窗前旋转的风轮，硕壮的大公马拉着消防车在布莱斯劳大街上急驰。小时候的回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带有玩笑性质的亲密感觉，又似乎无关紧要。当今的人最愿意回忆什么呢，人们宁可津津乐道那些技术文明的进步：从瓦斯灯过渡到电灯，第一辆汽车的问世——它引起的冲击波可与地震相提并论，稍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叔叔有一辆军车，我得到一次搭叔叔汽车的机会，而且竟然行了上百公里，简直心都要跳出来了！看的第一场电影，父母装的第一部电话，转动的拨号盘——号码 7756——人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玩艺儿？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还有大人骑的三轮车，这些东西人们至今还能看得到。第一艘飞船飞过布莱斯劳上空的情景，当我从父母的餐叙中听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时，对我的冲击比巴尔干战争还强烈，“如果土耳其后方的百姓相互打起来有多好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我这个年轻人热血沸腾，我父亲却对我的反应出奇地认真。一次餐桌上的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父亲把话题打开，说泰坦

8

尼克号的沉没造成的死难者有一个大村庄那么多时，我对父亲的这个比喻回以鄙视的口吻说：“啊，那不过是一些农民”。我不得不向在我家当保姆的姑娘——她当然是从农村来的——道歉。这是一个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教训。

一种普鲁士军事国家传统的气息在我这个孩子身上也有体现。在米斯德罗的暑假里我每年都作为急切的战士和参谋在“沙滩战役”里服务，作为军事指挥官提出战役任务。当时，从1912年始，基本上我主要是对“战略”感兴趣，童年时期就羡慕拿破仑式的统帅艺术，当时报纸上到处都充斥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研究。人们预言我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军官前途——直到自己的内在性、诗和戏剧的梦想将我拉了过来。

当时还有一件孩子气十足的事，我参加了1913年在布莱斯劳为纪念“解放战争”而举行的展览——对一个13岁的人来说，首要的还是他参加爱国主义行动的自豪感。令我特别得意的是，我家旧花园里有一个古典风格的用沙石烧制的坛子，我竟然在展览场地见到了它。另外，我在一个相邻的年市上第一次看见用可可油烤制的饼子，这是进行德国殖民地宣传的一部分。像可可油这种东西在当时整日享受黄油和鸡蛋的富裕的施雷辛(Schlesien)人来说是稀罕事，简直可以说是发疯了。

另外一条塑造人的线索，并慢慢使人成形的便是学校。旧式学校时的校监打学生的做法虽然不再有了，但是往那些不注意听讲的孩子头上扔衣服，或者像小孩子自己讲的那样“吃头果”^{*}的事还是常有的。上外语课时那种在游戏中学习的方式引人入胜，

^{*} 指扔粉笔头。——译注

外语课的老师大都长相特殊,多有怪习惯,尤其是他们讲课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弱点更成为学生们窃窃私语的对象。

还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那是在为我们第一个在战争中阵亡的老师开的追悼会上,一个叫狄赖斯(Direx)的老师,这人看上去魁梧并且威严,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起来。还有一件像谜团一样吸引我自己去思考的事,两个老师关于宗教是否起源于敬畏的看法不一致。一方循循善诱,耐心启蒙,这一方的观点深深地打动了我,而另一方的那种盲目信仰劲儿和他把希腊语课讲得一团糟是一回事。然后,我们这一级的同学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在最后学年,越来越多的人被征入伍。战场上接二连三地传来死讯。饥饿的年代到了。战争和革命,中学毕业和入大学——这一切都像被生活的梦魇包围着。

1918年春,我离开中学,开始大学的学习,那年我18岁。和那些早熟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还是一个胆怯的、无可救药的、自我封闭的小家伙。完全不知道“哲学”是干什么的。我喜欢莎士比亚,喜欢希腊、德国的经典作家,特别是抒情诗,但我在中学时代既没有读叔本华,也没有读尼采。

战争时期的布莱斯劳是个平静的地方,有一股近乎慈父般的小地方气息,比普鲁士更普鲁士,远离前线。

我父亲是个药物化学家,一个有影响的专家,一个自觉、重成绩和精明能干的人,他这个人戏剧性地代表了那种主张对孩子威权教育的人的观点,既知道这是最坏的教育方式,也知道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最好地贯彻教育宗旨。他是个一心一意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兴趣又很广泛。我还记得,战争期间,有一次他在家里举行的小型聚会上为他们所里的人做一个关于波铍(Bohrsche)1913年

提出的原子模型的报告,我去给他拿那个原子模型体的情景。另
10 外一次,我帮他翻译一篇一个化学家用法文写的文章,记得是关于
苯环方面的,他尤其不长于法文。但是,他在让我做这些事时用心
深远,尤其是在引证霍拉兹(Horaz)的文献时。在我的青年时代,
旧时的“教育思想”已经垮了,他打心里反对我学文学、戏剧尤其是
学吃不上饭的艺术。我自己也根本不清楚应该学什么,只是学
“精神科学”这一点是心知肚明的。

作为一个胆怯的 18 岁青年,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判断,在大学
里怎样着手学习,那首先会是茫然不知所措的——只能不可救
药地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日耳曼文学(特奥多尔·希普斯)和语言
学(阿尔冯斯·希尔卡),历史(罗伯特·霍尔兹曼和约翰内斯·策
库尔什),艺术史(尤利乌斯·帕查克),音乐学(马克斯·施纳德),
梵文(F. 奥托·施拉德),伊斯兰文学(阿图尔·普雷特里乌斯),
所有的东西我都窥视一番,遗憾的是没有涉足古典语言学。学校
对我发挥的引导性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倒是我父母的朋友威
廉·克劳尔,这位讲故事很有趣、很吸引人的人,我对他佩服得五
体投地,他对我也很感兴趣——就像一些年后也是半个语言学家的
物理学家克莱芒斯·舍费尔对我发挥的作用一样——站出来反
对父亲而为我的兴趣方向辩护。

我对心理学着迷了一阵子,很短暂。起因是:刚上大学,我怀
着急切和好奇照着修课目录制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所谓“按计
划”的意思是:尽可能多地,也意味着:尽可能早地。1918 年 4 月
的一个早晨,大约 7 点钟——当时我还是一个营养不良的高个子
城市青年,征招入伍还不够格——我参加了一个心理学研讨班。
我原想这肯定很有意思。我觉得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

类有很深的见识。于是穿一身黑袍就进去了——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天主教传教士。教室里坐着一排排穿着同样黑袍的人，一个很健谈的教授操一口对我来说听不懂的施瓦本方言讲了起来。我听他总是讲克米尔(Kemir)，过了很长时间，直到我猜出，这个克米尔实际是说“化学家”。几小时之后，这个教授讲解威廉姆·施特恩所做的对儿童心理的观察。他讲的那些我觉得顶可笑。于是我横下心，课后去问那个教授，他讲的东西是不是弄反了。他怔了一下，然后又回头看看图示，接着说：“啊，是的，您是对的！”一个18岁的青年去教导一个教授实在是太离谱了，还不如离开的好。这个教授本来是对中世纪哲学有体会的研究者，他的名字叫马蒂亚斯·鲍姆加特纳，只是出于某种协议的理由而去给有关的传教士讲解他根本就不懂的“心理学”。

在家中接受的新式教育主要得益于一本温和的文学书，即特奥多尔·莱辛写的《欧洲和亚洲》——其深厚、辛辣的文化批判深深地震撼了我。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不同于普鲁士的精明、重绩效、讲纪律的东西。后来我在更高的层面上又加深了自己的这个判断，尤其是在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人圈子里也遇到类似的文化批判的声音后。当然，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随着价值世界的变化也浮现出一个新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也是那些年追逐相互冲突的快感所要求的。社会民主党、民主党及保守党的代表人物——今天已被遗忘的名字，当时却是红极一时的人——对我来说首要的还是去体会一种政治的演说艺术，去相遇一种民主的、共和的理念，而这些是在学校和家里所陌生的东西。从前在家里受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还发挥作用，已是一个问题。当有一天——还是高中高年级学生时——我读到托马斯·曼那种非政治的审视方式

12 时,我觉得极有品味。不久以后,克尔凯廓尔(Kierkegaard)《非此即彼》的第二部分通过一位叫鲁道夫·威廉的编外教师的介绍,加强了我对非政治审视方式的认同。殊不知,这是一种对历史的纯朴直觉。要是今天我就会说,黑格尔远胜于克尔凯廓尔的思想。

当我做大学生时,我读到的第一本哲学书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克尔巴赫(Kehrbach)的解读本,这本书是我父亲图书室的藏书。在我父亲那个时代,如果人们想做哲学博士,即便是自然科学家也要做一个小型的哲学博士口试,为此,他当然就做了关于康德的哲学口试——在马堡(他的辅导老师是年轻的格兰德[Albert Görland])。这样,我在 18 岁那年的大学假期读了康德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如果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尽管我通读了这本书,但并没有体会出它的思想。

大学图书馆也没有给我多大裨益。有一天,像我这样胆怯的人,作为第一学期的学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图书馆预定卡西尔《自由与形式》这本被推荐的书。当我几天后去问这本书的着落时,那个单薄、说话咕咕噜噜的图书管理员没说一句话就将我的借书单扔出来,还带着一个对我来说谜一般的圆圈样的手势语。这一举动已足以让我对图书馆形成最终的恐惧了。

然而,我到底留在了哲学家那里。在做作的外行布道者欧根·屈内曼那里浪费了不算太长的时间。这人以一种华丽的发音、辉煌的演讲术将我引入到“逻辑方块”的幽密之中。我在他那里的感觉就像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斯(Protagoras)那里的感觉一样,听起来是太美了,每句话都振聋发聩,但就是无所教益。理查德·赫尼希斯瓦尔德拖泥带水的报告及尤利乌斯·古特曼导来导去的立论又别有一番滋味。所有这三个人都是新康德主义者。

到了第三学期,我只是例行地参加了赫尼希斯瓦尔德精心准备的研讨班。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个研讨班的题义以及我是怎样捞了个“优秀”的:是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义与词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于义¹³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初试哲学就投错师门。于是我转向马堡。

马堡的回忆

1. 大学生年代

大约在 1930 年,小说家列奥·施皮策接受科隆大学的聘书,在离开马堡时为他举行了一个告别会,他做了“什么是马堡”的演讲。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列举了一大串机构和人名,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马堡”。他的有些话是很伤害人的,他说“这才是马堡”的第一个名字是鲁道夫·布尔特曼。事实上,如果让我回顾 20 年代而说什么是马堡的话,布尔特曼的名字是不能缺少的。对我来说,除了布尔特曼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一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当时年轻人因为学哲学而去马堡的,奔的都是马堡学派。赫尔曼·科恩虽然因为退休离开了马堡并于 1918 年去世,但是保罗·那托尔普在那里任教,在他周围还凝聚了一些较年轻的人,像尼古拉·哈特曼、海因茨·海姆塞特。况且 1919 年以后的几年,并不是学校能够平静地从事教学的年头。君主制的崩塌,新的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新的魏玛共和国的软弱构成了那个缺少方向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年轻人就端处在这样的困惑中。即便今天回忆起来还是很难理出个头绪。当时德国民主的贫弱程度就如当今世界技术的不完备一样。

15 我自己来自施雷辛,德意志军事帝国的发源地之一。我在年

轻时就经常见人反对无私奉献的军国主义立场,并对此怀有特殊的罪责,这不仅因为我的兴趣和观点偏离我家的民族自由主义传统,而且首先因为我父亲根深蒂固地认为只有自然科学能谈得上是科学。他曾试过说服我,但很快就看出来,我会成为一个“胡扯的教授”。是啊,事实也就是这样。

在艺术史家理查德·哈曼周围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人讨论着最冷静、最自由的思想。哈曼当时着手编排他在战争前拍摄的法国大主教教堂的影集。这些后来出了名的、马堡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一部分照片,上面笨手笨脚的题头就出自我的手。哈曼是个能调动所有人工作能力的天才。他游览的兴致令人害怕,因为他要求所有同行的人都拿出和他一样的兴致。在哈曼的圈子里,我认识了第一个朋友奥斯卡·许雷尔,他当时是出了名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那一代表现主义诗人的成员。哈曼那里总是不断有许多的拜访者出出进进。我记得在他那里碰见了大胖子特奥多尔·道布勒。毫无疑问,在他的圈子里也不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小市民气的马堡随处都能找到这类人。所有能刺激和惊动市民制度的东西哈曼都喜欢。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召集一些暑期军团的人,在市剧院上演格奥尔格·凯瑟尔的剧本《瓦斯》。因为当时还不流行签一年的工作合同,演员在夏天就没事可干。如果他的艺术展能引起市民的强烈抵触,他就会特别高兴。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的学业去咨询一个语言学家,他颇不以为然地说:“好,这样吧,这样的事应归我做,而不应老往哈曼那里跑。”这个语言学家首先建议我在埃德蒙德·史腾格那里钻研文献学——这件事我做了,而且很有收获。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照旧往哈曼那里跑。无疑,哈曼身上有高度典

型的非市民精神。就他的高智商和真正的自主性来说,他是一个以日益提升的专业精神对抗人事文化(Personalkultur)的令人信服的实践者。然而他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地方还是在他的伦伯朗学习班里。年轻时的哈曼(1907)在分析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精神时曾写过生活与艺术中的印象主义,此时似已置于脑后。但他的“西方艺术史概述”——所谓的“公里课”,他以飞快的速度讲解一幅接一幅的照片,显示出一个天生的社会学家的能力,与其说是注重单一作品还不如说是教人们去看出某些关联来。

很快,又有一群人登台亮相了。这些人猛烈的文化批判直入时代精神。这群人的核心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他是格奥尔格的亲密朋友,是个经济史学家。每个星期三下午四点至五点他都会抨击 19 世纪的文化野蛮。后来我也参加了他主持的讨论班,在他的讨论班里与其说是强调尖锐地提出问题,还不如说是重视某种温情的尊严。在那里人们会碰上沃尔特斯老老少少的朋友,像瓦尔特·埃尔策,这人后来成了军事史学家,卡尔·彼得森和沃尔特斯一起做了一些文艺方面的研究。还有赫尔穆特·冯·登·施泰恩兄弟,瓦尔特·特里奇,鲁道夫·法尔纳,埃瓦尔德·福尔哈德,汉斯·安东。还有马克斯·科默雷尔,他后来在马堡从事一段短时间的珍贵的教学活动。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圈子,这个圈子的构成有点像教会:福佑受洗者(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我自己则在圈外,没有受洗,有点“知识分子”在外围为其奔走呼号的意思,

17 像后来我所说的那样,实际上是禁止更年轻的人进入圈子内。但这一条禁令禁止不了有时候安东在深夜拜访我或我去看他。以后,几年以后,他把他的朋友科默雷尔派到我那儿去,这促使我和科默雷尔之间建立起一种建设性的友情。

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穿一件非常漂亮的皮大衣，戴一块华丽的链表，像个中世纪的银行家，和我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当我1922年患了脊髓灰质炎被严格隔离时，他是第一个无视规定去看我的人。我记得我和他的一次交谈，在这次交谈中，有些方面由于我的哲学兴趣以及很可能因为我的谈吐不清楚使他对我有些嫌疑。主要是谈到保罗·那托尔普课上提到过单纯(Individuität)这个范畴。沃尔特斯警告似地举起他的指头说：“个体(Individualität)——对此您要小心”，我回答说：“不，是单纯(Individuität)”。对此沃尔特斯说：“啊，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完全清楚，这并不是另外一回事，只是他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他谈的东西对我总算是一种挑战：在一个原子化着的社会里，斯特凡·格奥尔格圈子的价值取向在较高的精神层面上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意识，这意识想必能激励人，这种激励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个人理由——出于自己的封闭和自圆其说——都是不能否定的。为此，诗人格奥尔格对我发挥的影响越来越有力。特别是奥斯卡·许雷尔把我较深地引入到诗的世界中去之后——不是通过文学研究，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使我对这位诗人的诗韵开了窍，诗人本人*我只在裸脚门碰到过一次。他拘束地垂着眼，我被他侧影的永恒线条打动了。

但是很自然，我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定局——我是个年轻的“哲18学家”，在哲学研究班上很快就有了在家里的感觉。当时一切都还停留在计划上。我一个平原来的孩子——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布莱斯劳度过的，一大早从我父母当时住的马尔巴赫街出发，翻过达姆

* 指格奥尔格。——译注